

全球化与身份认同

从《十亿之夜》看后现代语境下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史月

摘要: 认同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 而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女性写作所寻求的身份认同往往是多元认同的结合。本文力图通过对在阿拉伯国家甚至在西方世界都享有盛名的作家嘉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十亿之夜》的介绍, 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关键词: 嘉黛; 《十亿之夜》; 后现代语境; 宗教认同; 政治认同; 性别认同; 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 史月,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2-0068-07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十亿之夜》(下文简称《夜》)是20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现代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36}, 也是阿拉伯著名女作家嘉黛·萨曼(下文简称嘉黛)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2]65}小说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 嘉黛也因此戴上了阿拉伯世界文学领域, 特别是小说领域“最优秀女作家”的桂冠。^[3]

《夜》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其创作手法或技巧, 而更在于作品具有的深刻社会意义。在《夜》中, 嘉黛描绘了因黎巴嫩内战而旅居海外的阿拉伯移民百态, 考察了这些远离本民族文化之根、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移民在面临西方价值观念异化和坚持本民族文化归属中的身份认同选择。作为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追求独立, 不懈探寻身份归属并主动参与身份建构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多元化所导致的复杂性使嘉黛的努力尤为可贵。她在作品中着重探讨了文化身份认同, 这不仅使处于西方社会边缘的阿拉伯移民产生强烈共鸣, 也激起了面临以西方强势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阿拉伯本国人民的思考。

在《夜》中,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体现为多种认同指向的彼此交织但又主次分明, 嘉黛不仅引出了对宗教认同、政治认同的思考, 还将对文化认同的探寻放大为所有阿拉伯人共同面临的课题, 从而将性别身份认同提升至更成熟的阶段。这种对身份认同, 特别是文化身份认同的积极探讨正表明嘉黛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身份认同复杂性的全面考量。

一、宗教身份认同的淡化

虽然身为穆斯林，且深受《古兰经》影响，但宗教身份认同却没有成为嘉黛认同的主要倾向。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没有宗教归属，全书唯一真正提及宗教身份的是一位穆斯林，即萨赫尔的兄长希拉勒，他的名字具有鲜明的宗教归属。在小说中，他的作用便是以一个笃信伊斯兰教、来自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半岛的海湾人身份用伊斯兰教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抨击大资产阶级萨赫尔父子的行为，从而使这种谴责更具说服力。

对宗教身份认同的淡化正也许是由于嘉黛深受萨特、加缪存在主义思想影响。^{[4]37}她的出发点并不是宗教之别，而是出于人道主义观念本能地去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她在叙事中力图宣扬人道主义，从而“达到了美学与伦理学的高度结合”^{[5]13}。在世界各国丰富的游历生活让她有了广阔的人道主义情怀，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讴歌爱和美，鞭挞丑与恶。她见证了时代的变化，为时代向着更文明、更人性化方向发展而欢欣鼓舞，也为旧时代的残余仍然禁锢人们的思想而痛心。而身处第三世界的处境，也让她能充分利用这种边缘身份，在体验西方社会的疏离感的同时，在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苦苦追寻中拓宽视野，去主动认知并积极探讨身份认同的多元性。

二、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性

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广阔层次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法的两极”的“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的转型”之间缔结了联系。^{[6]34}“个体，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每一个生存于晚期现代性场景的个体，都是核心的问题。”^{[6]80-81}虽然焦虑和不安在各个社会都普遍存在，但在晚期现代化社会中，全球化打破了以往固定的疆界，空间不再成为禁锢封闭的所在，而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颠覆了将人的身份界定与国家边界、地理因素相联系的传统知识，而随着这两者的疆界逐渐被打破，人的身份“不能够以地域性的民族国家来统一建构”，而应由其“具体的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来建构”^{[7]65}。身份认同由此呈现多元、流动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态势，政治身份的认同不再成为建构身份认同的主要取向。

在《夜》中，嘉黛并无意对某个特定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进行大段描述，只是在几处对阿拉伯世界的落后状况和黎巴嫩内战中满目疮痍景象发表感慨。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西方世界，联系海外黎巴嫩人与阿拉伯世界的纽带以文化为主，相比之下，对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并不十分强烈。世界文学中有个不约而同的比喻，那就是用旅途来比喻人生，自由地行走意味着动态和变化，而家则意味着固定和束缚，联想起嘉黛在被叙利亚政府缺席审判后主动与资产阶级家庭切断联系，即使在叙政府解除禁令后也再没有回到大马士革的做法，可以看出，跨越不同边界的经历让她对国家的政治身份并不十分重视。

同样以内战为背景，《夜》与另两部长篇小说，即《贝鲁特 1975》与《贝鲁特梦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并无明显的地理标识。作为实际地理存在的贝鲁特在《夜》中只出现于小说的开篇，此后它便只在阿拉伯移民群体的回忆与向往中出现，日内瓦才是小说的主要空间场景。此外，主人公之一的哈利勒得以在欧洲各个城市游历，这意味着主人公在大的空间背景下有了自由移动的权利。虽然小说体现了嘉黛对巴以问题、黎巴嫩内战的关注，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祖国黎巴嫩强烈的思乡情绪，甚至在小说结尾还让哈利勒重回黎巴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政治身份的强烈认同，

反而显示她对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心理。虽然嘉黛热爱贝鲁特，认为它是心灵归属，但叙利亚大马士革才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她至今仍旅居法国的现实似乎也可以证明，她对政治身份的认同有着一定的矛盾性。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对文化之根的坚持就尤为坚定。因为阿拉伯文化才是维系阿拉伯移民与阿拉伯各国的共同纽带，因此，嘉黛对阿拉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相对而言更为强烈。

三、性别身份认同退居其次

“身份认同是任何个体都会面临的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只有通过确认身份，个体才能够获得心理的安全感。在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这种认同感中，个体的主体性才得以建立。”^{[8]332}以写作去“寻找，捕捉自身的真正生命”^{[9]141}，进而实现对主体的确认和对身份的认同是阿拉伯女作家们在身份认同道路上的共同手段，虽然她们“在身份认同、独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斗争的历史上，确实获得了比在别的领域多得多的进步。”^{[10]23-24}但也正如评论家加里·舒克里所言，除了嘉黛·萨曼以外，其他女作家们的作品千篇一律。^{[11]30}在这些被指责为毫无新意的作品背后，则是女作家群体陷入的集体困顿。在没有更深化的认识之前，她们的身份认同几乎整齐划一地局限于对性别身份的认同，过分强调两性的差异和对立。

但这种彻底反对男性、将男性视为女性对立面的立场，只会由于偏激而引起狭隘，在女性自我认同的道路上陷入无法转圜的困顿状态，因为“过分膨胀女性主体（即写作者女性意识载体）倾向，而这种膨胀最终与男性压迫在实质上相通，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带来妇女全面解放”^{[11]75}。这一点正是嘉黛在探寻身份认同道路上努力跨越的障碍，因为“如果女性创作依然以敌视、抗争的姿态呈现，而不去寻找一条男女共融的生存之路，把男女对抗作为长久的斗争方向，势必使世界的情绪处于激烈状态，而人类的发展则难以为继”^{[12]191}。

嘉黛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她并不将目光局限于体现女性问题，而是将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与人道主义精神纳入视野。她对写作的思考和通过写作对身份认同的探索不仅始终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演进与深化，因此才能以其强烈的批判和自省意识始终保持对实现自我的渴求，在探寻身份认同的道路上不断突破瓶颈，开启新的征程。这不仅反映在嘉黛对性别身份的认同有更为深化的认识，也体现于她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极大关注。

她并未将性别身份认同作为身份认同道路上的主要方向，而是让不同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各种矛盾与对立关系置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加以叩问。远离文化之根带来的彷徨沮丧与缺乏安全感，是所有阿拉伯移民所共同面对的窘境。《夜》描绘了身处文化冲突地带的阿拉伯移民的群像，而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主人公是哈利勒和莱伊拉。但不管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民族文化之外、饱受良心谴责与煎熬、最终选择回归阿拉伯文化的哈利勒，还是生活在西方、努力改变生活方式、甚至改名换姓却依然无法摆脱原来的归属、无法被西方女性所接纳、也无法摆脱幼时所受的东方价值观念和传统影响的莱伊拉，他们所承受的，是在多元文化的夹缝中、在精神危机中备受困扰的阿拉伯移民的痛苦，也是身处第三世界的阿拉伯人共同承受的痛苦，在这样的语境中，性别身份的认同退居其次，而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探寻逐渐成为身份认同中的重大命题。

四、文化身份认同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指向

《夜》以嘉黛的第二故乡贝鲁特为小说的开端和结尾发生的空间，以她曾经生活过的日内瓦作为主人公们的栖身之处，这正是她将个人经历主动融入创作并加以反思的结果。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嘉黛身处西方社会、兼具“观念和行为上的西化与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14][12]}。如此矛盾的她将内心的茫然与困惑转嫁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使得《夜》中的主要命题便集中在对多元文化夹缝中饱受精神危机困扰的知识分子该如何确立文化身份认同的探讨上。

为躲避黎巴嫩内战而逃亡至日内瓦的哈利勒终日为莫名的恐惧感、深重的孤独感、难以调和的疏离感包围。他从战争中逃离，却在西方遭遇了足以摧毁其身心的更猛烈的战争，这种痛苦便来自于挥之不去的疏离感，他流落异乡，却又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难以确定的归属感和认同危机让他每天都在忍受煎熬。为此，他一度通过吸食毒品来麻醉自己，试图从虚幻的世界里找到乐趣。但当毒品的效力过去，他的痛苦就会加倍袭来。这种痛苦来自于背井离乡之苦，也来自于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嘉黛以哈利勒之所见所闻，暗示了阿拉伯国家的现状。吸食毒品后的哈利勒在梦境中不无伤感地看到：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从阿拉伯国家攫取各种资源，凭借科技领先和经济强势奴役当地人民，使他们在饱受了西方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后，又要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文化殖民，曾经泽被东方也照耀西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被逐渐边缘化，其自主性被动摇甚至可能丧失。阿拉伯世界曾经拥有的辉煌一去不返，如今的阿拉伯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在世界民族之林，弱势民族无法在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安之若素地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哈利勒的梦境并非虚幻，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阿拉伯人应该清醒地直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面临的这种尴尬境地。只有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全面振兴，在社会、经济方面增强实力，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

外部环境的混沌与内心的混乱曾让哈利勒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几乎无法找到自我的本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与社会的阴暗面却让他更感阿拉伯文化的魅力，因此无意融入西方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针对来自强势的西方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猎奇式的解读以及身处西方所感受的切实冲击，他渴望声张自我和本民族的价值，然而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痛苦记忆却让他对回归犹豫不决，使他不得不在反观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承认，阿拉伯文化的复兴仍然任重道远，阿拉伯民族的振兴也仍需努力。

尽管面临撕裂性的痛苦，但哈利勒并没有放弃对身份认同的思考，他终于明白，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独善其身，那么现实中的阿拉伯民族就永远会成为西方贬低的对象。身处异乡的阿拉伯人如果将西方文化绝对化和神圣化而对本民族文化妄自菲薄，终将因为个性的缺失而成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从而导致民族自尊心、凝聚力的丧失。而只有追溯到阿拉伯民族文化的本源，才能增强信心和自豪感，对抗西方文化的异化。长期的思考终于让他下定决心带着孩子重回黎巴嫩，与阿拉伯民族共患难，因为惟其如此他才能找到归属感，也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指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莱伊拉，尽管她最初非常适应新生活，对与阿拉伯世界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但她却始终无法掩盖内心的焦灼和脆弱。艾米尔所倡导的理想社会让她觉得如同海市蜃楼般飘渺虚无，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由，却处处受到压抑。身处异乡的莱伊拉一方面渴望自由与独立，另一方面却又对阿拉伯民族的传统风俗、伦理道德念

念念不忘。她严守东方的人际交往方式，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交往方式，崇尚婚姻，但同时又企图摆脱阿拉伯文化传统对她的种种束缚。对自我的极度不满以及信仰的动摇和崩溃让她对自己产生怀疑。在远离阿拉伯社会的环境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作为本源文化的阿拉伯文化面临“被分化、渗透、淡化以至边缘化而产生‘文化的失真’和‘文化的改观’”的危险，而她想摆脱传统社会，割断与过往的联系，便意味着对“本源文化的淡化或无形的低贬”^{[15]379}。她实践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以为可以成为其中一员，然而投奔大资产阶级拉基德的怀抱使她不仅遭受离散于祖国之外的痛苦，也让她继续承受来自阶级和性别的压迫。

身份认同的指向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异中。不管是哈利勒的遭遇，还是莱伊拉的命运，都清晰表明，对宗教、政治以及性别身份认同的探讨，都已不再成为嘉黛的写作主题，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考量才是嘉黛探寻身份认同道路上的主要指向。

五、文化身份认同探寻中的叛逆与坚持

阿拉伯知识分子大都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有着切身感受。阿拉伯小说自诞生起便不乏涉及此类题材的作品，但人们往往只提及埃及的陶菲格·哈基姆的长篇小说《东来鸟》（1938年）以及苏丹的塔伊布·萨利赫所著的长篇小说《迁徙北方的季节》（1966年）。事实上，最早涉及东西方文化碰撞并在小说里触及文化身份与现代化问题的应为叙利亚女作家阿菲芙·凯拉姆的《白迪阿和苏阿德》，它的发表比《东来鸟》早了三十余年。^{[10]55}可以说，阿菲芙·凯拉姆更为先觉地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前辈的思考为嘉黛提供了启迪，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也促使她必须注重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全球化并不局限于经济的全球化，同样也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随着地理边界的流动性，文化的疆界被打破，成为动态的变量。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个体乃至整个集体的文化身份构建，“在世界各地以及在联合国，不断增长的国家体系间的互相依赖，突出了文化间的差异，使许多人更紧密地依附于他们觉得可能受到威胁的族裔—历史和文化遗产。当全球一致变得更加突出时，人们所具有的自身文化价值的不可取代之感变得更为强烈。”^{[13]171}不同文化碰撞带来的精神认同危机日益成为知识分子焦虑的原因，《夜》对后现代语境下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带的阿拉伯移民心态的深度刻画正是源于同样在探寻文化身份认同道路上踟躇前进的嘉黛的亲身经历。

作为一位阿拉伯知识分子，一位客居西方、深受其文化影响的第三世界女性，嘉黛对自由不遗余力的追求让她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在远离祖国、饱尝离散之苦的情境下，西方世界的发达与先进让她目不暇接，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也对她构成强烈吸引，随着“原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不断消融瓦解，传统价值标准和取向逐渐异变”，她“深感‘自我’的失落，却又找不到摆脱这种苦恼和困境的出路”^{[15]29}。作为身处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她虽然能以学识和知识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却也不可避免地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矛盾彷徨。

她试图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寻找平衡，因此扎根于阿拉伯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去看待西方文化。对前者在批判中接受，在叛逆中体现坚持，固守阿拉伯文化的传统与价值却不固步自封，在离散中克服异化，从客观认识和批判中实现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文学）的消化和转化；对后者在接受中批判，在坚持中体现叛逆，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敞开怀抱但又不对其顶礼膜拜，从冷峻的反思和清算中实现对阿拉伯文化的皈依和认同。她既对祖国的现状感到担忧和不满，又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她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的解放与解脱，而是主

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对接，用人道主义精神去关照整个世界。

《夜》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吗？”可以说，这是嘉黛对文中所有主人公发出的疑问，是对所有阿拉伯人的疑问，也是对自己的疑问。哈利勒内心矛盾重重，虽然最终选择回国，但却不免在读者心中激起这样的怀疑，作为一个没有在西方社会找到立足点的阿拉伯人，哈利勒的回归是不是在西方无法找到成就感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虽然纳西姆将在完成学业后回归建设祖国，但觉醒后的冬妮娅何从？作为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导师的艾米尔·尼利又将有怎样的结局？哈利勒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始终处于犹豫与坚持的矛盾状态，他感慨西方的文明程度，却也对它的阴暗面有清醒认识；他想坚守传统，却发现自己举步维艰；祖国的命运让他忧心忡忡，虽然最终决定回国，但回归是否意味着无谓的牺牲？纳西姆也许会在学业结束后捧着一颗建设祖国的赤诚之心回国，但他是否能在祖国找到用武之地？觉醒后的冬妮娅是新女性的代表，她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对西方文化十分熟稔，但这样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女性是不是会在回国后，与相对保守的阿拉伯世界格格不入？而被祖国驱逐的艾米尔·尼利是否还将继续著书立说、充当西方社会阿拉伯移民的精神导师，最终也无法真正为祖国所接纳？可以说，无法对这四个人物未知命运一一作答正是嘉黛内心忧虑、彷徨的集中体现。

这种忧虑和彷徨与她试图确立的文化身份认同并不矛盾。因为包括文化身份认同在内的身份认同的“内容及其含义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理解和态度随着文化、时期、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从来不是静止固定的……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总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以及群体与个体的需要和成见不断地流动、变化”^{[14]35}。既然身份认同本来就是一个在寻找、确立、颠覆、重构……之中不断变异的过程，那么期间既可能出现进步或上升，也很可能伴随着踌躇与倒退，困惑与迷失。

尽管生存环境的变迁对身份认同的取向和塑造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主体的能动缔造者，“在实践中通过异化和扬弃来实现主体人的自由”^{[17]78}。虽然认同会随着时代境遇、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个体经历的改变而改变，但认同并非是一种被动的过程，而是认同主体主动干预的结果。因此，《夜》最后的疑问也正说明它绝不会是嘉黛对身份认同探寻的结束，因为生命不息，对身份认同的努力追寻就永远不会终结。然而，这绝不是夸父追日的疲于奔命，也绝不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徒劳无功。个体只有不断地追寻自我身份认同才能安身立命，而整个民族只有不断地认识自我、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身份也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一席之地。

六、结语

通过对《夜》中呈现的不同身份认同指向的分析与说明可以看出，嘉黛对认同的渴求从未停止，她对身份认同的探寻轨迹清晰可辨。作为女性，她从自己的性别出发，对性别身份的认同十分明晰，然而，在全球化的多元复杂世界，由高度现代性产生的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变迁逐渐凸显，在这种大格局下，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固然十分重要，但已经无法成为其身份认同的唯一向度。相较之下，文化身份的认同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因此，当她意识到性别认同并非自己的归宿后，便开始了质疑和批判，也启动了新的挖掘和探索。于是，她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中将“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和观念等”^{[17]212}多元因素的合力编织入自己的叙事文本，真正为阿拉伯女性甚至是阿拉伯民族立言。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和构建自我的思想模式与叙述方式都有一致性可

求。”^{[18]265}而嘉黛以其长篇小说创作所呈现的这种历史厚重感和使命感,以及对阿拉伯女性身份认同的不懈追寻和努力探索,为阿拉伯女性的身份构建,甚至阿拉伯民族身份以及世界其他民族身份构建的版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启迪和宝贵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麦哈·丁·素卜哈. 文学立场[M]. 大马士革: 阿拉伯作协出版社,1989.
- [2] 阿里·嘎义木. 十月报[J]. 大马士革, 1990-8-6.
- [3] 瓦菲格·盖里兹. 嘉黛作品中的性[M]. 贝鲁特: 先锋出版社, 1994.
- [4] 尤利娅·凯尤. 嘉黛作品里的叛逆与坚持[M]. 贝鲁特: 先锋出版社,1992.
- [5] 阿卜杜·莱克弗·阿勒纳乌提. 嘉黛的部分作品一览[M]. 大马士革, 1993.
- [6]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7] 苏红军, 柏棣.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8] 乐黛云. 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9] 蔡毅. 创造之秘[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10] 布赛娜·舍阿班. 阿拉伯女性小说百年[M]. 贝鲁特: 文学出版社, 1999.
- [11] 哈南·阿瓦德. 嘉黛小说中的阿拉伯事件[M]. 贝鲁特: 先锋出版社, 1989.
- [12] 荒林. 新潮女性文学导引[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 [13] 西慧玲.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4] 安东尼·史密斯.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 龚维斌, 良警宇,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 [15] 鲍晓兰.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 [16] 王振科. 同根的文学[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1996.
- [17] 张云鹏. 文化权: 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向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8] 王艳芳.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9] 嘉黛·萨曼. 十亿之夜[M]. 贝鲁特: 嘉黛·萨曼出版社, 1991.

On The Complexity of Self-Identity in Postmodernism Context: A Case of *the Eve of Billion*

SHI Yue

Abstract Identity crisis is a hot topic in our times; the identity presented in the female writing crossing nations and cultures is typically a mixtur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complexity of identity in Postmodernism contex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e of Bill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Ghada al-Samman, a famous writer known in Arabic and western world.

Key Words Ghada al-Samman; *The Eve of Billion*; Postmodernism; Religious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Gender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钮松)